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九辑(2018年第1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粮食生产下滑真的源于农地产权边际效应递减吗?

仇童伟 罗必良

社会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影响研究

鲁钊阳

公平关切、产品差异和双渠道供应链构建策略研究

浦徐进 刘 燃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

周佳雯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 工具与案例

付才辉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九辑 (2018 年第 1 期)

黄少安 主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8 年. 第 1 期: 总第五十九辑/
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141 - 9430 - 2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7026 号

责任编辑: 于海汛 段小青
责任校对: 隗立娜
责任印制: 李 鹏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九辑 (2018 年第 1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7 印张 320000 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9430 - 2 定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制度经济学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 办 单 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粮食生产下滑真的源于农地产权边际效应递减吗？

——来自 1978 ~2010 年中国省级数据的证据 仇童伟 罗必良 (1)

社会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影响研究 鲁钊阳 (33)

公平关切、产品差异和双渠道供应链构建策略研究 浦徐进 刘 燃 (58)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

——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 周佳雯 (77)

宏观经济和银行特征如何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

非利息收入规模 张蕴萍 高菁翊 陈 言 (99)

新股发行制度、资金超募与公司经营绩效

——基于中国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顾海峰 张 静 (124)

逆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检验

——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郑文凤 王素素 吕介民 (143)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工具与案例 付才辉 (166)

康德第一批判对经济研究中假设的意义 韩新峰 郭艳茹 (244)

后记 (261)

CONTENTS

- Does Decline of Grain Production Stem from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of Land Tenure? Base on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from 1978 to 2010 **QIU Tongwei LUO Biliang** (32)
- The Influence from Social Capital to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the
Business Entity of Newly-typed Agriculture **LU Zhaoyang** (57)
- The Strategy of Dual-channels Considering Consumers Fairness and
Products Differentiation **PU Xu jin LIU Ran** (76)
-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kou, Retur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Earnings
Gap between New Citizens and Original Resident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data **ZHOU Jiawen** (98)
- How do Macroeconomic and Banking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Size of Non-interest Income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ZHANG Yunping GAO Jingyu CHEN Yan** (123)
-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nstitution, Funds Over-raising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Chines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U Haifeng ZHANG Jing** (142)
-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Revers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ARLS **ZHENG Wenfeng WANG Susu LV Jiemin** (165)

The Applied Research Progres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ools and Cases **FU Caihui** (243)

The Significance of Kant' First *Critique* to the Assumption i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HAN Xinfeng** **GUO Yanru** (260)

粮食生产下滑真的源于农地 产权边际效应递减吗？*

——来自 1978 ~ 2010 年中国省级数据的证据

仇童伟 罗必良**

【摘 要】 以往研究普遍将 1984 年之后我国粮食生产下滑归因于农地产权的边际效应递减，这一方面忽视了农地产权作用发挥依靠的是赋予农户决策自由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也使得农地产权持续强化与粮食生产下滑的悖论一直未被阐明。为此，本文利用 1978 ~ 2010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经营效益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978 ~ 1984 年，由于国家粮食生产管制和城乡人员的流动约束，粮食经营扩大与国家收购价格的增长具有逻辑一致性，农地产权的强化也就有助于激励粮食生产。1985 年之后，由于农产品价格市场化和城乡户籍制度及劳动力流动的放开，农地产权的强化使得农户具有更多的自由按照比较效益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加之农户在产权稳定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多地进行非农转移，造成粮食生产下滑。由此可见，粮食生产下滑并非来自农地产权边际效应递减，而是因为农户决策自由的扩展，由此造成他们在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家庭要素部门配置中更有能力考虑比较收益问题。最后，文章从农业经营制度实施的情景约束，以及“交易装置”构建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农业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 粮食生产 农地产权 产权管制 比较收益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识别码：A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土地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革研究”（项目编号：71333004）、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项目编号：IRT-14R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比较优势、农业分工与生产性服务外包”（项目编号：15YJC790036）。感谢南京财经大学李宁副教授对本文地权测算数据的帮助，作者文责自负。

** 仇童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510642）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 15150561782@163.com。罗必良（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本保障,更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虽然稳步增长,但增速和播种面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尤其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速度加快,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副业化、农业经营超小规模化,耕地抛荒和闲置现象日趋严重,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也使得农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此,《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将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和种粮比较收益偏低等视为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虽然目前我国也面临粮食如何去库存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粮食生产的全局重要性,而且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粮食生产下滑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国粮食在1980~1984年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主要来自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和农地产权制度的完善。由此,学界也大多将粮食生产的增长和下滑归因于农地产权的内在激励及其释放程度。例如,黄少安等对中国1949~1978年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就试图证明不同的土地产权安排是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进而作用于农业总产值的变化。冀县卿和钱忠好(2010)则从产权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农地产权对1978~2008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认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比第一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虽然上述研究针对的是不同历史阶段,但它们明显忽视了农地产权的完善是通过赋予农户更多的行为自由来发挥作用的,这也是单独的农业经济变化所不能表达的。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作物种植和补贴政策,造成特定历史阶段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如果不将农地产权强化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释放作为一个重要情景因素加以考察,就不可能从农户家庭决策具有比较收益导向的基本点出发,反而会得出粮食生产下滑源自农地产权边际效应释放殆尽的滑稽结论。

由上可知,农地产权从来都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来自其他领域行为空间的扩大会使得行为主体更能发挥农地产权的内在激励。例如,钟甫宁和纪月清(2009)就曾发现,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民收入的独立影响并不显著,一旦将非农就业市场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产权稳定性对农民收入的正向激励作用就变得显著了。类似的,马贤磊(Ma, 2013)对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相关性进行的分析表明,只有村庄存在农地租赁市场时,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地流转的激励作用才会显化。此外,与众多研究证实的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地流转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的是,钟文晶和罗必良(2013)发

现,如果把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民的农地禀赋效应结合起来,那么由农地产权稳定性提高引致的农民农地禀赋效应增强必然会抑制农地流转,并内含了农地流转的代际分化逻辑。由此可见,农地产权的作用发挥具有高度的情景依赖特征。尤其考虑到一项制度指征的对象可能同时处于多个社会交换域,其对分析对象在特定博弈域中的作用也必定受到其他社会交换域的干扰。那么在人类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报酬为目的的基本前提下,产权对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也必然内嵌于他们预期收益多寡这一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强约束。

置于农地产权与农业生产的分析之中,贝斯利(Besley, 1995)认为,稳定的农地产权可以通过投资效应、借贷效应提高农地生产性投资,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绩效。陈志刚(2005)的分析则表明,日益增强的产权稳定性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更多激励,表现为农业绩效的提高。此外,李等(Li et al., 1998; 2000)、雅各比等(Jacoby et al., 2002)、冯淑怡等(Feng et al., 2010)和马贤磊等(Ma et al., 2013)分析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肥和有机肥等长期性投资的增加对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但真实的情况却是1984年之后我国粮食生产不断下滑,在此期间《土地管理法》(1998)、《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物权法》(2007)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2009)相继颁布,换言之,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增强与粮食生产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

为此,姚洋(1998)从地权稳定性、可交易性和使用权维度考察了农地产出率状况,发现完整的农地使用权对粮食作物产量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廖洪乐(2003)则认为,土地调整和农户的土地负担都使得农地的产出效率大大受损。此外,盖文和埃胡伊(Gavian and Ehui, 1999),戴宁格尔和吉恩(Deininger and Jin, 2006)对埃塞俄比亚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受限制地形、人口可迁移性,农地产权对农业绩效的影响或被抑制或并不显著。其实,上述研究不管是分地形或是考虑农户负担,本质上都是将农地产权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置于经营效益这一约束之中。尤其在当前,粮食较低的比较收益已成为农地转入户农业种植结构“非粮化”的重要成因。张茜等(2014)在对21个家庭农场的案例考察中进一步发现,粮食经营的高投入、低收益是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弃粮从经”的最主要原因。经营效益这一强约束俨然成为了制度实施的重要调节变量。而从经营效益进一步延伸出来就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经营先后面临国家统购、双轨制和市场化为主的过程,自然建构了粮食生产比较收益的不同表达方式,由此也构成了重新审视和理解1978年以来农地产权强化如何建构农户行为决策空间的重要自然实验。

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实质,以

及不同情景下农户基于比较收益调整种植结构及配置生产要素的路径选择问题；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并对 1978 ~ 2010 年主要粮食生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模型选择、变量定义及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是简要的研究结论，并从农地产权界定和细化的本质、农业经营制度实施的情景约束，以及“交易装置”构建等方面讨论了我国农业制度的制定。

二、产权作用的本质及其情景交互特征：理论线索

（一）产权的作用：自由建构抑或边际效应提升？

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就是除开一个主体外，其他主体或团体都被排除在外。菲吕博滕和佩乔维奇（Furubotn and Pejovich, 1972）认为，产权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其目标导向是界定不同主体的行为边界。这与哈耶克（Hayek, 1999）关于秩序的界定类似，秩序其实本质上就是赋予主体一系列的“自由权项”，即行为主体按照社会行动规则自由制订计划并实施，而不受其他主体强制性干预的行为空间。因此，产权边界界定的有效性实际上取决于主体行使产权行为的实际排他程度。阿尔钦（Alchian, 1965）则从产权实施层面进一步认为，产权的实施效力依赖于政府、非正式的社会行动和通行的道德或伦理规范，这也是近来罗必良（2014）将其引申至农地产权强度，并从国家赋权、社会认同和行为能力维度进行刻度的主要理论来源。但不管来自产权本身的界定或者从更大范围内的制度概念来说，它们最初都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和激励生产性行为的形象出现的。这一表述的含义其实就是说，产权是在建构一种社会行动规则，一种赋予行为主体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以使它们能够运用自己的默会知识明确自己能做什么，什么样的决策能带来比较收益的最大化。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巴泽尔（Barzel, 1989）关于产权排他性的概念也蕴含了一种组织干预的表征逻辑。按照哈耶克的二分类秩序概念，秩序可以区分为自生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前者更多地体现为社会自发实践经过选择和留存下来的指导人们日常行动的一般性和抽象性规则，后者则表达了基于特定主体和目的建构的具体并依靠任务发派的权威性规则。当考虑产权的实施强度时，如果不把二者区分就很难理解符合社会认同但并不合乎法律法规的风俗传统缘何经久不衰。引申至农地产权的分析当中，当学界一直在批评土地调整造成农地生产效率的下降时，作为村庄自发的土地治理模式是否能

单纯地从效率角度加以讨论似乎并未被考虑进来。如果从法律的制定上看,组织秩序关于土地调整的界定和行使范围似乎也不能否认村集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产权界定主体的现实。因此,不管是基本的产权界定或是对于社会规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秩序自由的扩展都被视为产权作用发挥的基本方式。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自由概念仅限于秩序的维度,而不指向情绪、政治和能力层面的自由,这也是基于产权本身的界定做出的选择。

但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另一种关于产权作用发挥的分析范式,或者说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概念。例如盖文和埃胡伊(1999)、戴宁格尔和吉恩(2006)关于农地产权与农业经营效益的分析,都是将农地产权的完备性作为解释农业经营边际效率变化的因素。此外,如李等(1998;2000)、雅各比等(2002)则从地权稳定性的维度,考察了土地产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结论均表达为农地产权的弹性或效率问题。由此,冀县卿和钱忠好(2010)、林毅夫(2010)就干脆将1984年之后我国粮食生产下滑直接归因于农地产权内在激励的释放殆尽,这本质上就是将产权视为一种可以量化和基数化的收益或成本问题。粗略看起来,如果将最为完备的产权视为一个盛满水的容器,那么在容器中的水由少变多的过程中水中鱼的舒适度也会存在着边际上变化,而且随着水量的增加这种边际上的舒适度变化会越来越小,这就是现行关于生产绩效与产权变化研究的思维方式。但他们忽视了,鱼的快乐不仅来自水量增加带来的生存空间的扩大,更在于随着空间的增大它们具有了更多的自由进行选择,而不是将主体的手脚捆绑住然后给他输液。

因此,产权的变化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其实早在哈耶克将市场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提出来时,秩序自由表达的就是行为主体的“自由权项”,而不是反映在能力和心理层面的东西。当然,由于禀赋条件的差异,不同主体在利用产权赋予的行为空间的能力也就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其表达的源自约束的自由。当然可以批判秩序的存在本身就限制了置于其中的主体的行动空间,但不可忽视的是,一旦脱离维持社会稳定和基本财产权利的规则或秩序,那么可能连起码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何谈行为自由。反过来,即使将主体的产权行使空间进行更大范畴的提升,也是在一定的约束中利用自己的禀赋和行为空间进行实践活动。^①因此,约束是一定的、可变且无法消除的,自由则是结构性的。这样一来,产权的作用发挥依靠的必然是主体行为结构的调整,即根据自身禀赋和社会行动规则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取向。

^① 这里不涉及基于武力或战争而完全占据人的权属界定方式,也就是说巴泽尔(1989)关于奴役制的分析在本文中是不予考虑的。

（二）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情景交互特征

青木昌彦（Aoki, 2001）将制度定义为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即子博弈精练均衡时为所有主体选择的一般性行为规则。在此基础上，兰杰和斯特恩（Lanjouw and Stern, 1998）、青木昌彦（2001）进一步认为，在社会嵌入的状态下，行为主体在特定制度博弈域中的行为决策或其主观行动可行集合的建构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到与之关联的其他子博弈的干扰，表现为同一制度体系下不同子博弈的互锁关联。置于农地产权研究领域，以往文献大多只是单纯地考察了农地产权对农户行为决策、农业生产绩效等的作用，而忽视了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情景依赖特征，这也是近来很多研究关于农地产权与农地流转之间作用路径和相关关系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实，如在马贤磊等（2015）的研究中，土地产权经历对农民土地产权认知的独立影响与以往研究类似，但村庄情景特征的引入则会通过强化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个人经历的作用路径。这其实也合乎维果茨基在其历史文化主义中提及的，以往社会科学大多依靠的是单维度或单向的成分分析逻辑，忽视了情景或历史文化在构建因素作用发挥中的作用。因此，单元分析也就构成了历史文化主义方法论的重要部分。仇童伟和马贤磊（2017）就借助了青木昌彦（2001）的制度关联理论，将农地流转子域与农业规模经营子域间的互锁关联作为调节农业经营绩效的外界环境，并对单元分析做了进一步阐释。

如果要将产权界定与主体行为选择置于不同的技术组合中，就需要假定这样一个前提：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以获取利润报酬为基本目的（即主体的同质性假设），产权的界定会使得主体的行为空间发生变构从而实现与目标约束的匹配，即主体具有根据行为空间和自身禀赋最大化经营收益的决策能力。在情形一中，假定产权的界定是针对特定子博弈的，与主体行为决策关联的其他子博弈均被组织力量限制，即主体只有在特定子博弈中进行决策和实施计划的自由。那么很明显，如果产权限定的子博弈中主体的努力程度与预期收益不一致，那么子博弈的参与主体只会生产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产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努力的剩余价值要么被产权界定者全部索取，要么被子博弈的其他参与者搭便车拿走。由此必然造成集体中普遍存在偷懒、出工不出力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上的人民公社时期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情形二中，假定产权管制稍有放松，赋予主体在特定子博弈中更多的生产决策自由，但其他子博弈仍然被组织限制。理论上说，子博弈参与主体生产决策权的扩大将使得他们基于比较收益生产更高价值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易获取最大化收益，但这是在子博弈中产品具有完备市场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如果组织规定，针对特定类型产品进行收购

干预，对其他产品进行价格管制。那么很明显，一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者必然尽力寻求努力程度与收益的一致性，从而导致价格诱导下的产品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这里我们是假定子博弈参与主体对该域中产品的生产技术具有同质性，不存在作物品种选择和种植的困难。情形三中，假定产权管制进一步放松，针对特定子博弈的产品生产不再进行价格管制。如果技术同质或者参与者对产品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转换能力，那么基于比较收益的假定，参与者必然会选择价值和市场需求度更高的产品。情形四中，进一步将产权的管制放松至其他与参与主体技术选择相关的博弈域。此时，参与者不仅可以选择在原先的子博弈中进行产品生产，还可以生产其他子博弈中的产品和进行技术要素的转移。这样一来参与主体的决策就不再限于特定子博弈的行为可行集，而是基于比较收益进行决策并将更多地考虑技术禀赋在不同子博弈中的转换成本和价格显化程度。

当然，上述情景假定都是基于经营行为展开的，而产权界定或制度实施可能还涉及社会文化、风俗传统和伦理道德等非生产性领域。但上述分析仍然契合了青木昌彦的制度关联性，可以发现产权在建构主体行为选择空间的同时使得他们能够基于自身的先验禀赋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在不同博弈域中的比较收益最大化。但限制不仅来自产权界定本身，也来自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产权的作用源自赋予主体更多的秩序自由，这种自由又是在与主体行为决策关联的其他社会交换域的互动中展开的。

（三）农地产权强化与粮食生产下滑：来自政策情景与行为选择的历史嬗变

为了剖析农地产权强化与粮食生产下滑之间的逻辑，首先需要对 1978 年以来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历程做一个简要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相继实施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农业经营形式，并连续实现粮食的稳定高产。1982 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家庭联产责任制已在全国层面实施开展，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有助于带动农村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1983 年的“一号文件”则全面肯定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中的最基本经营形式的地位。为进一步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益，1984 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土地承包制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1991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则再次强调把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保持下去，赋予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1993 年《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延长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至 30 年，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此后，1999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写入了宪法,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承包制的基础地位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强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由此可见,我国农地产权的强度在政策层面是不断强化的。但按照现有文献的逻辑,却可以理出这样一种结论:因为农地产权的强化会造成农户非农转移和耕地的非粮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大多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加之农地产权改革至今,其内在激励已经释放殆尽,必然对农业和粮食生产造成较大冲击。这是不是意味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还是国家应该将农地产权制度还原为1978~1984年以农产品统购来管制农业生产的模式?该逻辑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产权的本质及1978年以来我国各阶段与农地产权相关的经济或政策改革,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和管制政策、城乡户籍制度和农业税等,其中产权的本质则是理解粮食生产变动的基础。为此,以下结合产权的本质和对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情景设定,将我国农地产权与粮食生产的技术组合区分为三个部分:

1. 情景一:粮食统购下的价格诱导

1953年统购统销和1955年粮食“定产、订购、定销”政策的实施,使得征购、订购和议购的作物品种和数量被国家强行管制,粮食和谷物等的播种面积也被严格控制。据估计,1952~1978年,国家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各项农业税收及费用从农业部门获取生产剩余3992亿元。当然,这一时期可看作产权的完全管制时期,农户的生产决策和要素配置完全受计划体制约束,也为1978年之后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改革实施构建了一个情景参照。按照上文的情景设定,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到了户的层面,即产权强化了参与主体在农地经营层面的自主性。但国家采取的配套设施却包括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大农业支出等。虽然这一时期逐渐放松了对农产品征购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控制,但仅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就同比增加了20%,超购加价幅度也从原来统购价格的30%提升到50%。换句话说,即使农作物自由种植被放开,但通过不断提高历年的粮食统购价格,国家粮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增产。按六种粮食计算,1979~1981年每50千克统购价格由10.64元升至13.49元,累计增幅达到了26.8%。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的比较收益和农民的种植习惯造成了农村以粮为主的种植结构。而从人民公社解散后农村的现实场景来看,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入城市和工业,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白手起家。虽然此时农民可以选择外出打工,但受限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市场的匮乏,加之部分地区定期调整的习惯也会导致土地的不稳定性,

因此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相当受限的。其实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等级条例》就将城乡的基础设施、福利等做了严格区分，户籍制度也成为控制人口流动最重要的手段。由此，1978 ~ 1984 年形成了农地产权、户籍制度、农产品差别化价格体系的交互网络，作为理性经营者的农户在外部约束下进行的最优策略选择，莫过于提高粮食种植的精细化程度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使家庭经营活力与粮食价格提高保持一致。

2. 情景二：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推行下的种植结构调整

1985 年，国家正式取消了粮食统购，并对稻谷、玉米、小麦和大豆进行合同订购，订购外的粮食作物全部实行市场定价。1986 ~ 1989 年国家又逐渐调减了粮食的合同订购量，在此期间订购范围内的粮产品价格累计增幅超过 20%。但直到 2004 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之后，粮食收购市场才全面放开。从 1984 年后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上看，仅 1984 年粮食播种面积就同比下降了 3.18%，随后便发生了粮食总产量降幅 7.44%。与此同时，1985 年乡村农林渔牧的从业人员下降 7.58%，到 2004 年这一降幅已经达到了 43.08%。但本部分的分析需要假定农村劳动力往其他行业的流动依然受限，这样就可以单独考虑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从 1984 ~ 1990 年的劳动力流动来看，除 1984 年以外，1985 ~ 1990 年乡村农林渔牧的从业人员依次下降 2.10%、1.32%、0.82%、-0.93%（农村劳动力回流）、-0.14%（农村劳动力回流）和 0.03%，而且这样一种阶段划分还可以规避掉 20 世纪 90 年代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影响。该时期由于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逐渐下调，而且合同收购价格的增幅也有所下缓，加之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将农地承包期调整至 15 年，农户便开始在种植粮食之外加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例如，1985 年、1988 年和 1990 年粮食种植比例就分别下降了 3.18%、0.96% 和 2.25%，进入 90 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很显然，在非农就业市场还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得农户在作物品种选择方面更多地考虑作物的经济价值。当然，如果不考虑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技术异质性、地域自然特征和市场稳定性问题，经济作物的净收益一旦超过粮食作物，必然使得粮食的产量逼近国家合同订购量。

3. 情景三：就业路径转换下的家庭要素配置转型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开始了快速工业化阶段，对农业的补贴和剩余索取基本达到了平衡。尤其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此二、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以 1991 ~ 1994 年为例，乡村农林渔牧的从业人员依次下降了 2.05%、3.29%、2.58% 和 2.24%，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此外，1995 年出台的《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正式指出，在坚

持集体所有制和原用途的条件下,农户的承包地可以通过转包、转让、互换和入股的形式进行流转。其实从当时农民的负担来看,农业税从1991年的9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481.7亿元,加上村集体的“三提五统”,仅2000年农民人均的税费额度就达到了141.4元。如此大的负担竟使得二轮承包时部分农户选择少承包或干脆不承包土地,私下流转土地也因为负担过大和非农转移变得普遍起来。从数据上看,1993年和1994年,粮食的播种面积分别下降了1.05%和2.90%,1991年和1994年粮食产量则分别降低了2.52%和2.56%。这说明在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粮食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这一切主要归因于农户对农地处置权能的强化。一方面是自由流转权的强化和承包期限的稳定;另一方面,2004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将粮食市场收购全面放开,也使得作物种植结构向多元化和高产值作物转型。

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粮食生产在农地产权不断强化和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加强的阶段,依然受到国家补贴和购销政策的干预。例如,1994年底针对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连续三年提高粮食定购价格,1997年按照保护价全面收购农民余粮,2002年的良种补贴,2003年改革农业税、费征收,2004年“一号文件”则通过实施“两减免、三补贴”进而将农业补贴变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这些政策改革说到底都是在降低粮食生产的成本,也带来了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不同程度的提高。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了承包方(即农户)作为流转的主体地位,农户可以自愿和自主流转而不受集体干预。加之承包关系和期限在1993年就已经被确定,此时非农转移就更为普遍了。最为明显的现象是,2000~2010年乡村农林渔牧的从业人员每年的同比降幅都超过了2%,粮食生产下滑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时期农地产权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赋权带来的要素流动性增强,使得农民更多地参照比较收益在农业与非农行业之间配置家庭生产要素。就粮食生产这个领域而言,国家的策略也从早期的生产管制和统购统销向价格诱导和补贴优惠转型。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 数据来源

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的总成本、销售价格和亩产量的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78~2010),各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灌溉面